

MINZU JIUWANG YU FUXING SHIYEXIA DE SHANGHAI JINRONGYE

民族救亡与复兴视野下的上海金融业

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 编

中国金融史
集刊第七辑

复旦大学出版社

ZU JIUWANG YU FUXING SHIYEXIA DE SHANGHAI JINRONGYI

民族救亡与复兴视野下的 上海金融业

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 编

中国金融史
集刊第七辑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救亡与复兴视野下的上海金融业/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10
(中国金融史集刊. 第七辑)
ISBN 978-7-309-12586-3

I. 民… II. 复… III. 地方金融事业-研究-上海-近代 IV. F83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9677 号

民族救亡与复兴视野下的上海金融业
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 编
责任编辑/史立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0.25 字数 345 千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2586-3/F·2311
定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会

顾问

汪敬虞 洪葭管 叶世昌

主任

吴景平 杜恂诚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干杏娣	马 涛	马长林	冯绍霆	邢建榕	刘红忠
刘 平	刘志英	朱荫贵	何 平	何 品	吴景平
张忠民	张徐乐	杜恂诚	武 力	赵兰亮	戴建兵
戴鞍钢					

本辑执行主编

吴景平 李克渊

本辑执行编辑

张徐乐

编者前言

本辑是《中国金融史集刊》的第七辑,主题为“民族救亡与复兴视野下的上海金融业”,各主要栏目,如“专题研究”“学位论文”“档案史料”“旧文新刊”,均根据主题确定所刊用的文稿。

“专题研究”栏收入的各篇文章,均选自2015年8月31日举行的“民族救亡与复兴视野下的上海金融业”学术研讨会的交流论文,内容涉及货币、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同业团体、银行监管、银行家等领域的多个重要专题,如战时法币通货膨胀与国民政府维持法币币值的努力、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成立的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的运作机制与成效、抗战时期上海银行业的内迁、上海与大后方金融业的联系、孤岛时期的银行监管以及外商银行在上海金融市场的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证券市场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银行事业、日伪统治下的上海银钱业临时联合委员会、日本对华金融侵略、上海金融业战时损失的调查、抗战时期的银行家等。从整体看,这些论文选题专业性强,不少属于以往研究的薄弱环节,征引史料翔实,有助于拓展战时金融的研究领域和深化研究层次。

“学位论文”栏收入的《抗战时期的上海钱庄业研究》一文,是作者在其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定稿的,在对战时上海钱庄业的数量及资本额、组织形式的变迁、钱业公会执行委员人员的构成、钱业与工商业的关系等方面概述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抗战时期上海银钱业之间的关系、银钱业与政府的关系等问题。

本辑“档案史料”刊登了上海银钱业同业会员临时联合委员会主要会议记录,这组史料反映了日占初期上海金融业内部的状况及其与日伪当局的关系,系首次刊行,在此特别感谢上海市档案馆的支持。

“旧文新刊”重登的朱斯煌《我国战时金融》和陶学文的《上海金融业之前途》,分别成稿于抗战爆发初期和抗战结束前夕,对于了解时人有关战时金融相关问题的看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至于“书评”“学术动态”“资料架”栏目，旨在围绕金融史研究的新进展，介绍有关的资讯。

感谢学界同仁惠允赐稿及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帮助，也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对于本辑集刊编辑出版的支持。

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

2016年8月

目 录

编者前言	1
------------	---

【专题研究】

战时金融体系的维持：保护法币的挑战

..... [美] 柯博文(Parks M. Coble) / 1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上海证券市场与企业发展 朱荫贵 / 18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抗战时期往来函电中的上海银行家 彭晓亮 / 35

淞沪抗战后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制度述论 王 强 / 40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的上海银钱业临时联合委员会 吴景平 / 54

孤岛时期银行监管之再观察

——以报告文学集《金融线上》为视角 刘 平 / 62

新四军抗日根据地银行事业述论 马长林 / 76

上海与大后方的金融业

——以抗战时期云南为中心 戴鞍钢 / 91

抗战时期上海银行业的内迁 刘志英 / 98

徐新六和陈光甫：胡适战时日记里的密友 邢建榕 / 125

日本对华金融侵略的“急先锋”

——从外滩 24 号横滨正金银行上海支店旧址说开去 黄沂海 / 131

上海抗战损失调查档案概述

——以上海市金融业战时损失为例 庄志龄 / 138

扶持与破坏：孤岛时期外商银行在上海金融市场的

活动 宋佩玉 / 153

【学位论文】

抗战时期的上海钱庄业研究 李 晴 / 166

【档案史料】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上海银钱业联合委员会议事录
(1941 年 12 月至 1942 年 5 月) 吴景平 何 品 编注 / 208

【旧文新刊】

我国战时金融 朱斯煌 / 250
上海金融业之前途 陶学文 / 257

【书 评】

以微见著 鉴往知来
——评《近代浙江地方银行研究》..... 马陵合 / 266
心系当代 以史为镜
——评《近代中国票据市场的制度变迁研究》..... 刘志英 / 273
茶盐种种家常话
——读《稀见民国银行史料二编》..... 杨苏红 / 278

【学术动态】

从民族救亡与复兴视野出发考察上海金融业 申艳广 / 282

【资 料 架】

中国金融史期刊论文资料目录(2014 年 7 月—
2015 年 12 月) 马 琳 辑录 / 290
中国金融史研究生学位论文题录(2014—2015 年)
..... 王 梅 辑录 / 297
2015 年中国金融大事记 杨博文 辑录 / 302
2015 年国际金融大事记 杨博文 辑录 / 311

战时金融体系的维持： 保护法币的挑战

[美] 柯博文(Parks M. Coble)

一个功能健全的金融体系需要一种合理而稳定的货币。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战时中国的货币,法币的失败相当惨痛。东部省份税收流失,内部省份也无法开辟新的财源,同时还要支撑一场庞大的战争,国民政府诉诸简单的增发法币来弥补赤字,这直接导致了法币的贬值和恶性通货膨胀。比如1941年,政府靡费100亿元,而税收只有13亿元,高达87亿元的赤字主要就通过印发钞票来弥补。当这些货币贬值以后,政府继续提高数字,1943年赤字膨胀到20亿元,1945年为1.1万亿元^①。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官方银行共透支给政府126 192 100万元^②。

货币贬值,物价高涨。作为蒋介石政府的金融顾问,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杨格主要在财政部工作,他计算了国统区零售市场价格的变化。以1937年1月到6月的价格作为基数1.0,至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数字增长到19.8。从1937年战争开始,20倍的增长是非常严峻的,但却还是可控的。等到日本攻占缅甸,国统区经济被孤立,通货膨胀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至1943年年底,基于1937年1.0的数据,价格指数已经增长到228。战争的最后两年,这种恶化呈几何式加速,1944年12月达到755,1945年5月为2 167,1945年8月达2 647。抗战八年中中国货币的贬值极大地削弱了国统区,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的基础被摧毁了^③。

货币的持续贬值对拿工资的个人来说显得尤为艰难,包括军队和政府

① Chiang Kia-ngau, *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 - 195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 I. T. Press, 1958, p. 49.

② Arthur N. 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12, 15. 在学者林美莉的研究中,给出了稍微不同的数字:1943年的赤字为41 943 703 152;1944年为138 176 128 798;1945年为1 202 205 543 309。参见林美莉:《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38页。

③ Arthur N. 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p. 152.

里的职员。大家都认为,只靠工资是无法生存的,因此腐败和黑市活动横行,士气也大大降低^①。对日本的战争胜利并没有带来和平,中国开始准备内战。国民政府仍以军费开支为要务,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的复苏都很缓慢,印钞机制造出更多的钞票,但在短暂的缓解之后通货膨胀的情况变得更糟。1946年1月,上海的物指数超过了1 600(以1937年1月到6月的情况为基数)。一年之后上海的物价指数变成了8 177,1948年1月是140 743,在1948年6月政府通过注定失败的金圆券改革之前,指数已经高达2 877 000^②。

法币的贬值是必然的吗?也许基于战时中国的环境的确如此。但是中国1935年11月才颁布法币,用法定货币取代白银的地位,在战争爆发之前施行的时间并不长。很多国家用半自治的机构来管理国币供应,比如美国的联邦储备系统。而从一开始,在任何方面中国元就没有独立于政治控制之外。在没有外界评估的情况下,货币供应的决定取决于政治当局。许多上海银行家对新的政治控制感到担忧,他们回忆起袁世凯和军阀政府曾试图把货币当作岁入。1935年失去中国银行总经理职务的张嘉璈表达了这种担心,认为这使中国战时的通货膨胀成为可能。张嘉璈提到,财政官员曾经提议让中国银行成为官方储备银行,资本由私人银行、公民和政府提供。中国银行独立于财政部,货币供应由私人商业的代表来监管。这样政府就不能通过增发货币来依靠赤字财政^③。

这和战时发生的情况完全一样。在日本的大举侵略之下,中国是否有替代方案可能是另一个问题了。在1937年7月之前,法币系统的通货膨胀已经很明显。正如张嘉璈所说,“中国银行从来没有获得过独立的地位,也没有真的试图去管理国家金融。从新币制施行的1935年代到1937年中期,四家政府银行发行的货币从453 000 000增加到了1 477 000元。只有大约一半的增长是由于用纸币换发白银”^④。最初这种通货膨胀逆转了由于银价上涨带来的通货紧缩,有利于中国经济;但是这一过程打下了战时通货膨胀的基础。

① Parks M. Coble, *China's Wartime Reporters: The Legacy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06.

② 参见 Chang Kia-ngau, *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 - 1950*, p. 372.

③ Chang Kia-ngau, *The Inflationary Spiral*, p. 8.

④ Ibid.

上海的战争和“孤岛时期”

1937年7月日本进攻之时,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国家。外国帝国主义控制的上海公共租界是中国银行业的中心,而天津的租界是第二中心。外国银行,比如在上海和香港力量雄厚的汇丰银行不仅获益于其位于协约港口的地理位置,也因为大多数外国人在不平等条约下具有的治外法权而获得保护。所有在上海的近代中国银行都把总部设在公共租界里,那里可以让他们摆脱中国当局,获得自治。

这种情况的结果在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中立刻被显现出来。尽管这一事件现在被认为是抗日战争的正式开始,但是大规模的战争爆发是在1937年8月13日的淞沪会战。两场战役之间相隔五个星期,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都选择把他们手里的硬通货移出火海。南京声明法币可以自由兑换英镑和美元等硬通货,并决定维持这一政策。根据日方材料,在1937年7月7日至1937年8月13日间共有相当于423 000 000元的外汇涌入中国。上海政府银行持有的英镑锐减700万,接近总数的三分之一。即使资金的外流不断加速,南京仍然坚持法币的自由兑换^①。

当战争在上海爆发之后,政府开始采取措施。8月15日,中国的银行中止交付,账户被冻结,每周的取款额度不能超过5%,最多不超过150元。上海的银行系统大部分被冻结了,城市银行系统每日结算的支票数量从169 000 000下落到仅仅33 000 000。上海的私人银行活动也明显减少^②。政府必须通过银行间的拆兑来避免银行系统完全瘫痪。外国银行继续享有治外法权的庇护,可以躲过大多数的规定。

中国军队抵抗几个星期以后,国民党军队被迫撤退,最终放弃了都城南京,把军事总部设在了武汉。在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之后,国民政府搬到了重庆,直到战争结束那里都是国统区的首府。尽管日本军队占领了上海,但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大部分仍未被占领。这里成了著名的“孤岛”——一个被日本占领区包围的中立地带。在中国军队撤离之后,上海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平静,特别是外国居民们都试图一切恢复正常,当作战争没有发生。正如标准石油的一位外籍雇员所回忆的,“1938年,一边看着战争席卷中

^① 转引自 Lincoln Li, “An Alternative View on Occupation Policy: China's Resistance Potential,” in David Pong, ed., *Resisting Japan: Mobilizing for War in Modern China, 1935 - 1945*, Norwalk, CT: East Bridge, 2008, p. 90.

^② Lincoln Li, “An Alternative View on Occupation Policy,” pp. 90 - 91; Chou Shun-hsin, *The Chinese Inflation*, p. 119. 又参见张天政:《八一三时期的上海银行公会》,《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第118—149页。

国,一边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里工作是种奇特的经历。公共租界是‘中立’地带,战争是‘在外’的。我们和外边的距离近到可以从嘈杂的吵嚷中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又足够远到完全不会影响到我们每日的生活”^①。

货 币 战

从1938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可能是任何金融系统所遇到的最不寻常的环境。中国的现代银行在“孤岛”仍然开业,而蒋介石政府决定继续让法币自由兑换外汇,即使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决定。实际上,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孤岛”试图在敌人的包围圈内坚持从前的运营。处于“货币战”中心的中国银行家努力在竞争机制之下推进法币的专用^②。当日本的势力试图渗透进外国租界的时候,他们和国民党的对手往往采用“战争或恐怖”的手段,银行家个人和他们雇员的安全受到威胁。这使中国银行家陷于极度危险和困难的环境之中。

日本主张的“东亚新秩序”,对货币的管控是他们计划中的重要一环。但是日本在“货币战”中的失败可以归为两大原因。第一是日本支持的货币长期资金不足;日本没有为它在中国设立的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尽管法币为类似的问题所困扰,但是直到战争爆发后很久它的价值才贬到日本货币之下。第二,日本在亚洲大陆上的努力受到了内部不一致的干扰。中国北部是帝国陆军主导,它的政策是现有东北(“满洲国”)和河北省框架内的产物。与此相反的是,在中国中部和南部,帝国海军占优势地位,日本机构的增长也更加缓慢。在中国北部,日本推行了一种和日元挂钩的货币,而在中部则一直拖到了1941年。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观察到的,“在中国中部地区军队并不想建立我们自己的银行或者货币……日本决定把中国北部作为日本领土扩大的部分,但是对中部和南部则作为香港那样的外国殖民地”^③。

在中国北部,日本有把这一地区和日元挂钩的传统。满洲中央银行1932年成立,以元作为主导货币,1935年部分地将其和日元关联。日本人也广泛统计了朝鲜银行在天津分行所存的货币,把它和日元捆绑。1937年7月7日后,日本人首先使用朝鲜银行的货币,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储备,货币开始贬

^① Jack Sherwood, *Fond Memories of a Young Man in Old China*, as told to Matt Kenny, Bloomington, Indiana: Author House, 2009, p. 191.

^② 关于“货币战争”的具体研究请参见林美莉:《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

^③ Nakamura Takafusa, “The Yen Bloc, 1931–1941,” in Duus, Peter, Ramon H. Myers, and Mark R. Peattie, eds., *The Japanese Wartime Empire, 1931–194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79.

值。很快日本在中国北部的军队扶持了王克敏领导的北京亲日政权。1938年3月,伪政权建立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有时候英文也翻译为中国准备银行,这样更准确)。北京伪政权招募了一大批重要的银行家到董事会里,包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和大陆银行天津分行,还有冀东银行的老人。日本开始使用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货币,来取代朝鲜银行的货币。严格的控制使得这种货币很难兑换外币,即使是日元也不行^①。

1938年6月,王克敏命令他统制的区域内所有蒋政权发行的旧法币必须换成新的中国联合储备银行货币,限期一年。实际上,因为银行过量发行,没人想要这种货币。通常他们在天津兑换的时候,都会要求30%的折扣^②。John Hunter Boyle观察到,“货币只有名义上的支持,由于通货膨胀式的增发造成的贬值一月严重过一月”,甚至连日本商人也喜欢这种货币,因为它汇到日本后也很难换成日元。大量的法币储存在天津的外国租界内,在日本的直接掌控之外广泛使用^③。1939年春天,中央储备银行货币的价值只有法币的74%^④。同时,国民党政权严禁使用中央储备银行,更使得中国的银行,陷入北部的争端之中^⑤。

中国和南部的日本军队建立银行的步调更慢了。起初只是用日本银行发行的军券,军券甚至不能换成日本国内的日元。只有在日军的武力下军券在中国才被接受。至1940年夏天,在中国有多达600 000 000日元的军券^⑥。1939

① Nakamura Takafusa, “The Yen Bloc, 1931 - 1941,” pp. 171 - 179; Lincoln Li, *The Japanese Army in North China*, pp. 138 - 145; *Toa*, vol. 11, no. 3 (March 1938), pp. 64 - 66; for details on the East Hebei regime see Parks M. Coble, *Facing Japan*, pp. 272 - 273. 也可参见杨济成:《关于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65—76页。

② Nakamura Takafusa, “The Yen Bloc, 1931 - 1941,” pp. 171 - 179, 190; Lincoln Li, *The Japanese Army in North China: Problem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rol*, Toky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38 - 145; Parks M. Coble, “Chinese Bankers in the Crossfire, 1937 - 1945,” in Cindy Yik-Yi Chu and Ricardo K. S. Mak, eds., *China Reconstructs*,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3, pp. 164 - 165.

③ John Hunter Boyle, *China and Japan at War*, p. 98; Frank Tamagna, *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2, pp. 309 - 311; Kimura Masutar, *Jihenka no Shina kin'yu oyobi kin'yu kikan*, Finance and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since the Incident; Tokyo, 1941, pp. 59 - 61; *Toa (East Asia)*, vol. 11, no. 3 (March 1938), p. 66.

④ Ji Zhaojin, *A History of Modern Shanghai Banking: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China's Finance Capitalism*, Armonk: M. E. Sharpe, 2003, p. 212.

⑤ 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处史料》第一卷,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410—411页。

⑥ Frank Tamagna, *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 pp. 245 - 246; Takafusa Nakamura, “The Yen Bloc,” 1931 - 1941, p. 190; Robert W. Barnett, *Economic Shanghai*, p. 140; 寿进文:《战时中国的银行业》,出版社不详,1944年版,第74页。

年5月,日本在南京的代理机构成立了华兴商业银行,但是它缺乏足够的储备,货币没有被广泛接受。它的货币不能兑换日元,但是可以兑换法币。只有在汪精卫政权建立之后,才试着发行一种可以在中国中部和南部通行的货币^①。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日本没能及时给予汪精卫政府和他的机构以足够的支持,直到1941年1月南京伪政权才建立了中央储备银行,以周佛海为总裁。中央银行在上海外滩的旧址很早就被日军占领,现在则成为中央储备银行的上海分行。最终这一银行拥有了40家分行和1600名员工。尽管它是一家“中国机构”,但是却有40名日本顾问提供“协助”,这是几乎所有日本扶植的代理政权的常见特征^②。

每一个政权——北京的王克敏、南京的汪精卫和重庆的蒋介石——都试图让他们的货币尽可能广泛地通行。这些货币再加上几种小货币一起导致了“货币战”,而中国银行家们就处于火线之中。各方都想确保他们的货币占据主导地位,而法币的一个很大的先天优势就是它可以兑换英镑和美元等外国货币。

维持法币汇兑

在战争的开始国民政府就决定,为了维持法币的声望必须保证法币可以兑换外汇。在最初8个月的巨大损失之后,政府试图把币制稳定在战前的1元兑换0.3美元的价格上。蒋介石政府用了大量的外汇把这一价格维持到了1938年3月^③。之后政策发生了扭转,直到今天经济史学家对此仍然有所争议。上海的公共租界和天津的租界区完全被日本占领区包围,但他们实际上还是坚持运营一个开放的金融市场。日本人从这一情况中获利。齐春风在2003年的一份研究中指出,日本通过贸易从国统区获得法币,然后在上海把它们换成外汇^④。甚至一度人们普遍认为,王克敏在中国北部的银行可能搜集了大量的法币,再由日本人在上海换成外汇。《银行周报》警告说,这造成了

① Frank Tamagna, *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 pp. 317-319; D. K. Lieu, "The Sino-Japanese Currency War," *Pacific Affairs*, vol. 12, no. 4 (December 1939), pp. 419-420.

② Frank Tamagna, *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 p. 324; 寿进文:《战时中国的银行业》,第75—77页;Robert W. Barnett, *Economic Shanghai*, p. 25;姚盛祥、沈家振:《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始末》,《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1989年,第240页;胡宣同:《我所知道的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1980年,第155页。新的银行加入并代替了华新钞票。

③ Arthur N. 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p. 153.

④ 齐春风:《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法币流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37—169页。

一种危险的情况,即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可能会终结在敌人的手上^①。而在事实上,由于这一政策花费巨大,蒋介石政府在1938年3月13日公布了非常严格的外汇限制。中国政府不能阻止外国银行用法币交易,所以法币的官方汇率与实际汇率之间差异悬殊。中国因此又额外成立了外汇基金,即使大多数最后也终结于日本之手。与此同时,日本人和他们的代理政权发现维持法币是有意义的,因为法币可以自由汇兑,而伪币则不能^②。

这是一个可靠的政策吗?周顺新在他关于战时通货膨胀的研究中否认了这一点。“国际方面的很多问题一部分是由于政府维持高水平的货币对外价格而造成的,”他说,“荒谬的外汇政策在通货膨胀的早期阶段是显而易见的,但那时的中国政府为了维持对外价格,在没有有效的外汇和贸易控制之下耗费了它贫乏的外汇储备。”^③其他人认为上海的公开市场无疑为日本在短期内获利提供了机会。他们把用法币换来的外汇作为自己的货币和在华所有日本企业的储备。有的中国经济学家也觉得,在战时状态下,在上海和天津维持外汇市场自由汇兑首先有利于控制当地的帝国主义势力,而不是中国^④。考虑到日本可能通过获得法币来增加外汇,国民政府试图减轻这一问题。在1938年年初,它命令沦陷区及其周边地区的地方政府发行他们自己的货币来取代法币,觉得这样就能阻止日本人获得可汇兑的货币。但是这样的办法低估了货币体系的一体性,以及法币本身的强势^⑤。

尽管有这样的考虑,大多时候政府相信维护法币对中国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正如经济学家马寅初在1939年3月写到的那样,“敌人知道,要摧毁我们的国家,首先要摧毁我们的法币”。重庆方面觉得,只要法币在沦陷区普遍通行,日本人就无法建立其完全的经济管制^⑥。它的担忧之一就是,沦陷区的人民对法币失去信心会导致当地人抛弃法币,接受伪币。这可能会导致法币

① 《银行周报》第22卷第31号,1938年8月9日,第3页。

② Frank Tamagna, *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 pp. 271–275; Takafusa Nakamura, “The Yen Bloc,” pp. 178–181; Robert W. Barnett, *Economic Shanghai*, pp. 121, 142–143.

③ Chou Shun-hsin, *The Chinese Inflation*, p. 13.

④ Robert Barnett, *Economic Shanghai*, pp. 112–13; 殷锡琪:《外汇统制新政策之检讨》,《东方杂志》第36卷第2期,1938年2月1日,第19页。

⑤ 林美莉:《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第65—69页。

⑥ Lincoln Li, *The Japanese Army in North China*, pp. 141–142; 马寅初:《战时经济论文集》,作家书屋1945年版,第197页; Letter of November 3, 1938 from E. L. Hall-Patch in Tianjin to the British Ambassador at Shanghai, Sir Archibald Clark Kerr, Recurrency Situation in north China, PRO. FO 371/23445 F/806/75/10; Arthur N. Young Collection, Hoover Institution, Box 68, Memo of March 31, 1941; 朱楚辛:《三年来敌我间的货币战》,《读书月报》第1卷第11期,1940年1月1日。

涌向国统区并急剧增加货币供给,加速通货膨胀^①。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于1938年向美国行政院发出电报,督促美国支持法币,争辩说,如果任何一种日方的伪币取代了法币,“日本就会在金融、政治、金融和经济机构扼住外国及中国的活动,并且这种控制将会一直保持”^②。

中国政府的财政顾问杨格建议中国政府强烈提倡货币兑换,他在很多文件中都维护这种方法。在王克敏的货币与法币的竞争中,他注意到,法币在兑换性上占有明显的优势^③。杨格坚持,保持法币的兑换性会在战争中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他注意到,“远离日本占领的城市和港口的广阔内陆多是由游击队员控制的”,他们使用重庆的货币,所以“从内陆出口的货物,即使被卖到沦陷的港口,最终也不得不以中国的货币支付”。法币的活力削弱了日本剥削和控制占领区的能力^④。

但是在他25年后的著作中,杨格承认了这项政策必须付出高额代价。他承认实施该政策是十分昂贵的。“为了维持市面而售出的数量惊人的外汇令财政部长十分心疼,甚至让他担心外汇储备是否会陷入困境。”但杨格并没有改变他的基本观点,他仍然认为这项政策是正确的,外汇并没有累积在日本人手中。1939年4月,他听闻日本外务省的一位官员告知美国领事Horace H. Smit,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已经在不扰乱市场的情况下,将攫取到的海关税收的法币尽可能快地转为外汇。但是,杨格坚持他有理由驳斥这种声称的重要性^⑤。

1958年他在东京与战时在中国的日本银行家谈话。他们相信1938—1941年在中国用法币购买外汇的主要买手是中国人,并非日本人,其中包含许多内部人士。杨格坚决支持蒋介石政府并不提姓名,但他承认“战争时期的这一方面对中国而言是最不可靠的”^⑥。中国银行家可能就被包括在那些局内人之中。诸如金城银行的周作民在内的私人银行家,在上海的外汇买卖受限后派了代表到香港购买外汇^⑦。

杨格承认他可能对于孔祥熙施压过大,以使他为外汇市场提供资金支持。那时可用的资金不多。但他仍旧总结道:“若没有1938—1941年的维稳行动,

① 林美莉:《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第55页。

②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8, vol. IV, p. 113.

③ Arthur N. 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p. 169.

④ *Ibid.*, p. 235.

⑤ *Ibid.*, p. 236.

⑥ *Ibid.*, p. 238.

⑦ 林美莉:《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第53页。

可能在珍珠港事变之前就会存在中国在战争期间能否避免金融崩溃的重大质疑。”^①但是要说日本从法币的兑换中获利匪浅，许多在中国的日本人，尤其是军队和情报长官却并不信服。他们觉得攻击法币对于摧毁中国政府而言是必须的。他们承认他们曾在 1938 年 7 月 13 日向日本政府承诺摧毁法币的政策^②。

在珍珠港事变前后，有大量的美国顾问到了中国。像杨格这样的甚至在中国生活了多年，但是多数只是简单到访，提出“建议”。由于当时中国急缺外国支持，他们不得不听从这些外国访客的建议。回想起来，无论是位于华盛顿的或是像杨格一样驻扎在重庆的美国专家的意见并非充满想象。可能这并不让人惊讶。虽然二战对于美国有重大影响，美国经济仍沿着传统轨迹继续发展并实际获益于日渐增长的军需，它们最终将美国拖出了大萧条。或许如果美国的处境和中国一样，那么美国专家才会更加赞赏中国的实际处境。假设纳粹侵入了美国并跨过了美国的东海岸，美国的首都不得已迁至丹佛。如果曼哈顿和华尔街因为某种原因没有被占领，就像上海那样成为一个“军事孤岛”，在这些情况下美国的金融官员是否会认为通过保持美元在纽约的可兑换性以维持美元在全球的地位是第一要务呢？美国金融系统的理性反思本应是在经济中位居首位。即使是杨格那样在中国的专家似乎也从未称赞过东亚的帝国秩序被摧毁地多么完全。

最终中国政府无法维持秩序。维持法币对于外币的可兑换性的成本几乎枯竭了。而且，重庆政府（北京和上海的伪政权亦然）通过加印钞票来弥补政府的赤字，这导致了各个领域的通货膨胀。王克敏的中央储备银行在 1938 年至 1941 年间增发货币高达 450%。但是在中国努力维持上海的外汇兑换的同时，法币随着更多货币的印发也在贬值。虽然限制了外币兑换，也有从英国及美国（相对较少）获得的支持，法币的汇价仍从 1937 年的 29 美分跌落到了 1940 年 12 月的 6 美分。印制钞票的洪流在国统区和沦陷区都造成了通货膨胀，但是 1940 年晚期之前中储券的价值超过了法币。杨格注意到，1941 年北京政府的钞票“成了华北沦陷区的主要货币”^③。

珍珠港事变之后

日本攻击珍珠港之后，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上海的中立终结了，日本军

① Arthur N. 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p. 239.

② 林美莉：《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第 108 页。

③ 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p. 158; Takafusa Nakamura, "The Yen bloc," p. 181; Robert W. Barnett, *Economic Shanghai*, pp. 121 - 125, 133 - 135.